

MARTIN GILBERT

(英) 马丁·吉尔伯特/著

第二卷

①

二十世纪世界史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Two

1933-1951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二 卷

上

二十世纪世界史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Two

1933-1951

MARTIN GILBERT

马丁·吉尔伯特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二 卷

下

二十世纪世界史

**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Two

1933-1951

MARTIN GILBERT

马丁·吉尔伯特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世界史/(英)吉尔伯特著;周启朋等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ISBN 7-5613-2169-4

I. 二… II. ①吉…②周… III. 世界史:现代史-1900~
1999 IV.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704 号

图书代号:ZH183000

Volume 1: Copyright (c) 1997 by Martin Gilbert

Volume 2: Copyright (c) 1998 by Martin Gilbert

Volume 3: Copyright (c) 1999 by Martin Gilbert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版权代理公司安排授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大陆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二十世纪世界史

(英)马丁·吉尔伯特 著

印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本:880×1230mm 1/32

印张:97.25

字数:2800千字

版次:2001年1月第1版

印次: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13-2169-4/K·116

定价:480.00元(全六册)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齐世荣

副 主 任 刘北成 钱乘旦 周启朋 张蕴琪
林 海 高经纬 效 时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宇博 李小刚 李南友 刘北成 向 宏 徐秀丽
张 章 陈四益 效 时 周启朋 周 宏 林 海
郭 方 高大勇 高经纬 钱乘旦 熊志勇

第二卷翻译者 (南京大学历史系)

鸣谢、导言、1—3 章 严幸智

4 — 5 章 袁 满

6 — 7 章 王 勇

8 — 10 章 向建华

11—13 章 何 树

14、24 章 陈敏敏

15—16 章 吕 瑞

17—18 章 吴庆宏

19—20 章 李培峰

21—23 章 王本立

插图解说 周启朋

全书统稿 王宇博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百年沧桑,在人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历史悲喜剧。这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一个文化飞扬挥洒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一个动荡不安、战争冲突不断的世纪,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相互激烈争斗的世纪。

美国著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曾说过:“忽视未来的人,将会冒失去未来的危险。忘记过去的人,必然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为了更近距离地观览百年历史,也为了给后人留下可供镜鉴的依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在20世纪末向读者捧献了他的长篇巨著《二十世纪世界史》。本书一经出版,即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这不仅由于作者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更因为其比较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了这个世纪的本质特点,而奠定了它无可动摇的学术价值。

对于浩繁无涯的史实,本书采用了令读者一目了然的编年体写法,尽量做到重大事件一览无余,所有叙述均有资料可证,同时用生动而深入浅出的笔法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娓娓道来。但恰恰由于历史本身的严酷性和强烈的戏剧色彩,其字里行间的震撼人心之处,与作者平实的写作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其说是历史淹没了作者,毋宁说是作者整个人与历史融为一体,留下来的便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感受。

当然,作者的价值取向同样决定了本书的取舍,因此,在审

读全书的过程中,对一些明显的历史讹误及偏颇不妥之处,我们进行了少量而必要的删改。但出于尊重作者和保持全书统一性、完整性的科学态度,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擅自改变作者的叙述,相信读者对此会有自己的判断。

作为近 200 万字的长篇巨著,本书的翻译是一个较大的工程。第一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组织研究人员翻译,第二卷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指导、组织该系研究人员翻译,第三卷由外交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周启朋教授指导、组织研究人员及外交学系的教师翻译。参加全书审稿、核校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知识》杂志社、《瞭望》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但尽管如此,在面对读者时仍会有诸多缺憾,挂一漏万及不妥疏误之处在所难免。这些,只有待再版时再来弥补。

当二十世纪掩上了它的最后一页时,《二十世纪世界史》却让人类从头追溯百年轨迹。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与未来结成紧密而不可分的链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鸣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对许多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主要的我要感谢那些档案管理者、图书馆工作人员、作者和那些我的历史学家同事们,多年来,他们的收藏和作品成为了我写作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在本书所附加的参考书目中,我已经详细列举了作过直接引用的所有的著作。没有数以百计的其他同时代人、目击者、参与者、旁观者、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我是不敢奢望进行这本书的创作的。尤其要指出的是,历史学家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不可或缺的基础。

参考书目中提到的几乎每一本书,尤其是传记和普通著作部分所列的书,本身就是那些作者们多年来广泛搜集和研究的结果。现聊举一例为证:劳伦斯·D. 瓦尔克关于德国希特勒政权最初4年内希特勒青年会和天主教青年会的研究就在本书中被列举了115项内容。再举一例:在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日本人所俘虏的大部分美国人命运的一部书里,加文·杜斯就采访过178名战俘,或直接接触过这些人提供的证明。

近来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包括英美在内的许多国家,几乎每天都能在国内的报纸上读到几篇关于过去的某一事件的文章。我从许多这样的文章中获得过资料,并为此特别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这些文章。报纸的讣告也几乎每天登载那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生平事迹及对于事件本身的记载。

除了其他一些人的已经出版的著作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

中,一如从前,许多人还直接地向我寄送有关特定事件的材料,使我因此从中得到帮助。对于这些材料,我要感谢乔夫·卡弗尔(轰炸德累斯顿),山姆·切洛斯基(南京大屠杀),哈里·克鲁克斯(因伯唐事件),环境、交通和区域司的艾恩·爱德华兹(英国交通事故死亡统计),加拿大战争博物馆的弗雷德·加芬(加拿大参与朝鲜战争始末),美国交通部的林·赛因弗洛柯(美国交通事故死亡统计),冯·霍夫曼(佩莱流岛和昂戈瓦岛争夺战),让·豪斯(1944年2月华沙之行),已故温·冯·里尔(牙齿行动),威勒姆·普勒康(拜伦大主教、威勒姆·洛威和威克勒夫·洛赛克的命运),华莱士·雷德(帝国训练计划),斯坦恩·罗斯(流行感冒和其他传染病)以及阿洛·塞敏斯基(苏联军队进入东普鲁士)。

许多人向我寄送过资料,使我能用于本书的写作。为此我要感谢斯坦尼斯洛·比尔内基博士、麦尔菲恩·H.布鲁克斯博士、格雷尔丁·科恩、安东尼·科普莱、罗伯特·克莱格、艾力丝·杜克、约翰及罗·格拉德、大卫·吉尔伯特、理查德·哥尔斯密(理查德·施特劳斯协会主席)、理查德·哥特、简·哥特里普(朱利亚特学院图书馆)、曾纳·哈门、本·汉夫高特、任内·席尔伯梅·霍特、迈克尔·杰爵士、里克·卡道恩、詹姆斯·M.凯利兄弟、塞芝·克拉斯菲尔德、唐克·冯·克劳斯蒙德、大卫·利特曼、谢恩·麦克考伊、利恩·迈德尔、西力尔·马赞斯基、威克力·拉威、乔治·纽克·伯登(《美日电讯报》)、伊泽尔·鲍茨兰斯基、乔·雷利博士、杰耐米·克拉斯·帕克斯(克里斯蒂档案馆档案管理员)、罗伯特·罗斯特、詹姆斯爵士、山姆·茂泽斯、艾里特·S.鲁特(卡莱尔蒙特学院)、奥列格·鲁真舍夫斯基教授(俄罗斯科学院战史研究中心)、科林·D.赛尔斯、科林·辛德勒、杰弗里·辛格尔、芭芭拉·E.丝拜尔赛、M.理查德·施特劳斯、让·汤普逊、休·托耶、迈克·特勒扎、莱斯利·特恩伯格爵士、艾尔威尔的威廉勋爵以及盖尔·查莱姆赛克·

犹加拉。

我要特别感谢回答我众多询问并将其收藏的资料借给我查阅的图书馆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这方面我要感谢皇家档案馆的德·伯拉尔格夫人、位于费耶特维尔的阿肯色大学富布赖特文献中心的档案管理员贝蒂·奥斯、英国报纸图书馆的管理员和工作人员科林戴尔、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援助者信息处的劳任·科莱特、国际新闻录音处的经理埃蒙·迪亚斯、三塔集团夸伊铁路纪念馆的菲利普·贝蒂·理兹菲尔德(公共关系官员)以及空军上校布鲁斯·卫恩(代理秘书)、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 罗斯福图书馆的沃伦·W. 牛顿主任、伊斯比约市档案管理员乔根·迪克曼·拉斯墨森、伦敦图书馆的阿墨达·罗伯逊以及伦敦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情报助理莎拉·威斯特。在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还得到过驻伦敦的新西兰国防参谋加利·艾伦、泰国驻伦敦大使馆二等秘书普加·安帕蓬、新西兰国防部图书馆埃文·海德、瑞士驻伦敦大使馆大使弗朗西斯·诺德曼阁下以及荷兰王国驻伦敦大使馆大使J.K.R.D.冯·罗延阁等人等的帮助。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使用过的个人收藏的资料由以下人士提供:汤姆·弗莱明、哈里·雅各比博士、亨利·米勒、罗伯特·奥尼尔教授、孟毛斯的巴罗尼斯·帕克、哥哈德·施恩伯纳、亨利·施瓦布以及西朋·斯威夫特。

与当时报道过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或以此为基础进行过创作的人士的友谊早在多年前即已引导我详细阅读了当时的报纸上的文章;这方面我深受G.E.R.哥德以及亚历山大·沃斯的影响。1962年,迈克尔·波兰尼教授与我交谈时便强调过,正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自由必须有广泛的基础。杰拉米·卡弗尔帮我解决了一些国际法方面的难题。拉利·安帮助我解决了美国宪法史上的一个难题。休·兰希帮助我用“俄国的眼光”看

待苏联问题。像前一卷一样,我以前的老师和朋友、历史学家阿伦·帕尔默仔细校读了本书的打印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莫里斯·J.马塞尔提供了许多来自英国的重要报纸和历史资料,同时对我的询问充满耐心,并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建议。在有关英国的史料方面,凯·汤普森同样富有耐心和成效,在收集资料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要感谢哈尔顿·盖迪图片资料收藏处,其中尤其是卢伊奇·迪迪奥同意我任意查找其收藏的大量图片中能为本书提供图解说明的众多图片资料,同时我也从中演绎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复制这些图片得到了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伊斯比约市档案馆、帝国战争博物馆、霍德和斯图顿、耶路撒冷的亚德·瓦声的同意,其余的则得到了哈尔顿哥蒂图片收藏处的批准。

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阿拉贝拉·派克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夏洛蒂·撒切尔在关键性的一个星期内向我提供了帮助。同前一卷一样,迪姆·阿斯普敦把我那些极其粗糙的地图草稿修改成了极端清晰的地图。威廉·莫洛公司的贝茜·哥德哈特给我寄来了遥远的鼓励。我儿子乔舒亚在巴黎帮我寻找墙报和纪念物。我的另一个儿子大卫则帮我编写索引。一如过去 27 年里我出版的每一部书一样,我妻子苏茜给了我大量的鼓励和灵感。

导 言

人类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合法交往而进行的长期探索……

——哈里·杜鲁门总统

本书——三卷本的第二卷——主要涵盖 20 世纪中叶从 1930 年开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 19 年内的历史。“二战”和其他数次战争,其中包括开始于 1937 年的中日战争和开始于 1950 年的朝鲜战争的各个方面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同样,这些战争也支配着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生活。就在 1927 年 9 月 24 日——即距本书所叙述的开始年代 6 年半前的时候——国际联盟就已经宣布“侵略战争”为犯罪。德国和日本都是该宣言的签字国。一年以后,根据《布赖恩—凯洛格条约》——德国和日本同样是签字国——61 个国家的政府宣布不将侵略战争作为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0 年内,最终通过谈判签署并得到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同意和欢迎的这两个庄严的条约使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各种争端的原则得以确定下来。

短暂的和平时期仅仅 20 年后即被中断,这成为 20 世纪历史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极权主义的巩固和扩展,随之而来的是迫害与战争。如果说军事极权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本卷的绝大部分篇幅,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已经成为了决定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生命的力量,同时,它也毁灭了如此多的人们的生

命。在苏联和意大利,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已经在各自的国家中掌管了镇压大权。本卷所述时间开始时,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仅仅3个月,但他却已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目标。

民主并非一直以其最吸引人的方式得到宣传,但无论在国
内还是国外,由于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因而它一直力图维持在世界上的位置。得到合法统治和民主制度支持的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与专制统治、秘密警察的统治等反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充斥了整个20世纪。本书所涉及到的1933—1951年之间的将近20年内,这一斗争几次达到高潮。要求合法统治和滥用权力成了国民和统治者之间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种族主义,暴政,诸如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导致人权被剥夺这一方面同样限制了个人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

在本卷所涵盖的年代里,合法统治与非法统治之间的斗争,以及个人权力的攫取与摧毁这些权力之间的斗争居支配地位。1937年,罗斯福总统告诫全世界人民:“毫无疑问,90%以上的人民希望生活在合法统治和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广为接受的道德准则而形成的和平环境之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寻找一种办法使其愿望得以实现。”罗斯福还说:“不幸的是,具有传染性的世界范围内的无序统治似乎正在不断扩散。”

7年之后的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丘吉尔在询问意大利人民在战后法西斯主义被彻底打败之后,他们希望建立何种政府时,曾强调过合法统治和遏制个人权力。其中的一个问题涉及到战后即将建立的法庭的性质。他问道:“即将建立的这类法庭是不是应该按照与人类思想相关联的正义和正派的普遍原则进行?”丘吉尔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的义务服从于国家利益的个人权力是不是应该得到维护、肯定和赞扬呢?”

面对“二战”所带来的灾难,杜鲁门总统亦同丘吉尔一样强调人权应该作为社会的保护神,从而确保个人能在该制度下生存和发展。

对和平的探索,以及寻找一种遏制专制的方法,成为了广大民主国家、中立国家和所有容易受到比其强大的邻居的强权和贪婪攻击的民族国家政权的追求。在本书所涵盖的这一段时间内,人们曾分别在 30 年代晚期和 50 年代早期两次就如何避免战争的爆发进行过大量的思考,同时也做过巨大的努力。当这些努力失败以后,人们又竭尽全力抗击侵略。1950 年,当亚洲爆发了朝鲜战争,苏联进逼西方的危险产生之际,是杜鲁门总统竭其所能从过去的教训中找到了拯救未来的妙药。杜鲁门说,“当德皇和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之时,他们都认为美国不会介入。他们梦想能够将自由国家分裂进而一个个地吃掉。今天,不能再有发生此类错误的任何借口了。”

尽管发动战争和保护国家利益的无法遏制的要求不断出现,但本世纪在医学和科学方面仍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在改善千百万人的生活方面,技术也有所进步。但贫穷者、被剥夺者、无家可归者和难民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经常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在本书中,难民几乎无处不在。大多时候,他们是有意迫害的牺牲品,在其他时候,他们是在逆境中不懈斗争的人。这样的逆境通常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内战和革命。

每个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不将自己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的、建立在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反思的基础上的观点和看法带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来我一直意识到这一事实: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几百万人跟我一样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但却在战争中惨遭杀戮,永远没能长大成人。他们自身创造幸福、友谊和家庭幸福的多种潜能和创造力永远没能

得到发挥。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同样生于1936年,但没能长到10岁便夭折了的人——这些人当中有欧洲人、亚洲人、基督教人和犹太人、波兰人和德国人等等,不胜枚举——我深感自己与他们的故事有某种联系,并希望在我的书中提到他们。

书中的许多章节是基于纪念与反思的。举例说来,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对战争的直接反应,并不断对后人产生影响。本书中数以百计的事件,尽管持续时间极短,但却成为了众多书本的主题。1937年“南京大屠杀”即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944年美国“朱诺号”巡洋舰在几分钟内沉没又是另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这些章节中描写的每一件事,尽管通常篇幅极短,但却完全能扩展成一本书。小说也经常能够反映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和主题的。我从中引用过有关章节的小说有玛莎·基尔霍恩、阿瑟·柯厄斯特勒、乔治·奥威尔、艾伦·佩顿、让·保罗·萨特、亚历山大·索尔兹黑尼金和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在记叙本世纪的斗争和成就方面,诗歌、电影、音乐和绘画同样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本世纪最初30年过去后,在战争、内战和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并未减少,事实上还有所增加。这些人包括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中每天死亡的人数和后来在战后冲突,包括中国内战(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以及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每天死亡的人数。

艾尔弗雷德·凯津在其写于1973年的《生命中光明的一页》一书中,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时写道:即使是最乐观的知识分子也放弃了这样的希望——和平,即使像1939—1945年之间的“正义战争”已经彻底结束了国际罪恶和不道德行为;即便世界上总有一天会消灭战争。凯

津写道：“世界上有如此多赤裸裸的恐怖，地球上有如此多新的战争，人们普遍有一种不祥的预见，认为‘争端’不久以后便会变成可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爆发的战争——战争远远没有结束。战争成为了 20 世纪人类不断的体验。”

保尔·富塞尔在他的《伟大的战争和现代记忆》一书中引用了这段话，他指出，虽然 1916 年那场无休无止的战争的形象本身“确实有一些滑稽和夸张色彩”，但 1972 年 9 月 1 日的《纽约时报》上的“美国驻越南参谋官员看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这一标题却是实实在在、毫不夸张的。对此，富塞尔评论道：“因此，现代历史的飘浮不定，已经使荒诞不经变得通俗易懂；使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变得正常合理。”

自然，流行病和地震等对人类的苦难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间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年中全球有 300 万人死于肺结核。而在今天，这种疾病却完全能治愈甚至完全避免。每年死于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的人数，就是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相比也令人震惊和无法接受。在本书所覆盖的 10 几年内，至少有 25 万美国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这些统计都有名有姓，在他们身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依然在为其死亡而痛惜。他们的事业未竟，生活中的愿望也还没来得及实现。

如果要如实地描写，那么关于 20 世纪的历史就没有一章离得开关于暴力的描述。但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的目标和动机一直都是为了改善和提高日常生活的质量。即使在他们受到了最剧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的鼓动时，也无一不是这样。那些生活在 20 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为其文明的成就而骄傲，并且因此而致力于改善自身的生活质量。因为这些进步是从黑暗时代衍生和进化而来的。1940 年，E. H. 冈布里奇和 E. 克里斯写道：“文明教会我们谴责残酷和侵略。它在现实和实践中曾经闹

得无法无天。”当这些文字得以出版时,在这个已经号称文明化的地球上,“残暴的现实”又一次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就普遍接受的字面意义而言,历史总有最终的胜利者:除了军事上的成功之外,那些在战争中打败对手而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同时也在疆土和财富方面获益颇多。但即使是在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恐怖、痛苦的恶魔以及痛苦时刻惨痛教训的记忆却远非胜利本身所能覆盖。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种种斗争无一不是为了阻止未来的战争,为了创造一种机制,培养一种心态以有利于各类争端的和平解决。但这些斗争不管是以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的斗争,抑或是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斗争及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都反复地朝暴力或暴力威胁发展。在这几十年里,种族仇恨也经常骚动,历史学家H. A. L. 费舍尔 1935 年几乎绝望地评论道:“一种失去理智的种族主义正在威胁着将文明这件无缝的天衣撕得粉碎。”

原子能是衍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被用作获取胜利的手段的最具破坏力的威胁,但同时也是阻止这一破坏力的最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在民主国家内导致了普遍愤怒的威胁。在这些国家内,反核力量提出了道德和医疗方面的理由来反对这一战略论点。氢弹的开发使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 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50 年代呼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放弃核武器,同时他们还敦促这些国家“找到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国家内所有引发争端的一切事务”。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们强调说,“一场依靠氢弹进行的战争很可能使人类走向毁灭”。

这些给人类——以及人类栖息的广大地区带来的威胁已经被一些国家和民族所意识到。为了维护合法统治和个人的权利,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采取一种道德姿态。在本世纪前 50 年